■书 评

国家力量与军人精神

——读黄传会报告文学《大国行动》

□张 陵

正在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的中国海军编队，突然接受一项国家任务，立刻前往突发战争的也门，执行国家的撤侨行动，把正在当地工作的中国公民接回祖国。于是，军舰改变航向，驰向陌生的海域，奔赴承受沙特联军不断空袭的战区。然而，等待着这支海军舰队的是什么样的命运？作家黄传会的长篇报告文学《大国行动》讲述的就是这个真实发生的故事。作品全面详实地展现这项国家救援行动的全过程，真实描写了中国外交官和中国海军军人的牺牲精神，生动塑造了一个敢于担当负责的大国形象，也生动呈现了中国海军军人的群像，反映出“走向深蓝”的中国海军的时代风貌。这是一部新时代中国报告文学的优秀作品，也是当代中国军事文学的重要收获。

在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中国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通过经济文化的交流合作，中国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然而，潜在的风险也非常大。由于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因素相互作用，这些地区和国家正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局面，地区矛盾冲突不断发生，战争也随时有爆发的可能。也门就处于这样的情况。因地区不同，大国支持的武装派别形成的割据和冲突局面，到了2015年终于爆发为沙特联军的空袭战争。在这个国家实施合作项目的中国工程人员和与之相关的中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中国政府果断实施撤侨，保护中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实际上，在这个中东地区撤侨行动已经不是第一次。2011年，中国政府组织动员包括国际力量在内的海陆空三方面的力量，在一个星期内，把几万中国侨民从战争一触即发的利比亚撤出，创造了中国撤侨史上的一个奇迹。也门撤侨规模没有这样大，但局面更为复杂严峻。首先，也门战争已经爆发，各派冲突加剧，战斗异常激烈，情况极为凶险。其次，从空中和陆上撤侨已无可能，只有海上一条路，利比亚撤侨模式无法套用。其三，从海上撤侨只能动用正在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的中国海军。在当今，非参战国的武装力量要进入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外交上军事上甚至技术上的问题更为复杂。应该说，这是也门撤侨的新难题。从这个层面上说，也门的撤侨更为困难，任务更为艰巨。中国的外交官们就是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完成复杂的外交工作，扫清障碍，为撤侨行动顺利进行提供了坚实的保障。而中国海军则是第一次参与这样的国家行动，承担起国家使命，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大国行动》把也门撤侨的复杂性、艰巨性全方位展现出来，一方面帮助读者深刻认识中国走向世界的意义，也深刻认识到这个历史进程的风险。更为重要的是，帮助读者深刻认识我们国家处理国际危机的能力与水平在不断提高，从而更深刻地认识到一个大国的智慧与力量。作家的思想意识非常清醒。他显然要告诉读者，国家力量在这个时候是具体可感的，那就是对每一个在海外的中国公民的责任担当，对每一个在海外的中国公民生命的尊重与敬畏。作品写到两个普通旅游者在危难中得到外交人员的关心与救助，最后顺利登上自己国家的军舰这一情节，生动写出了国家对公民的责任。还有一个细节令人难忘，那就是挂上中国国旗通过武装派别冲突地区这个细节，充分展现了中国的国际影响，也充分展现了国家力量对每一个中国人的支撑。类似这样的细节在当年利比亚大撤侨时真实地发生过一次，几千中国人唱着国歌代替护照进入突尼斯海关的情景历历在目。正是这样的国家，给人民以安全，以信任，以力量。所以，当中国军舰出现在海面的时候，码头上的人们才如此激动，泪流满目。

作品显然还告诉读者，很多时候，国家力量的体现，不在于国家大小、实力的强弱，而在于一种担当，在于一种意志，在于一种精神。在这部作品里，这种精神更多来自中国海军军人。作品写到了中国外交官们的奉献，并把更多笔墨放在海军军人身上。作者长期在海军工作，对海军生活更为熟悉，作品的表现内容重点放在突出军人精神上。这个选择是有作者深意的。作品提供给我们中国海军建设发展史资料，旨在提醒我们注意到，中国海军正是顺应世界军事变革大势，抓住历史机遇，走向深蓝，开始现代化建设进程大提速。虽然海军建设与世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实力还有一些差距。但是，中国军人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责任、精神和品质高于一切；不惧强敌，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坚强意志与必胜决心一点也不输给别人。有了这种精神，就会有强大的力量，就有不可战胜的力量。作品的这些深刻思考，支撑起主题思想的时代精神高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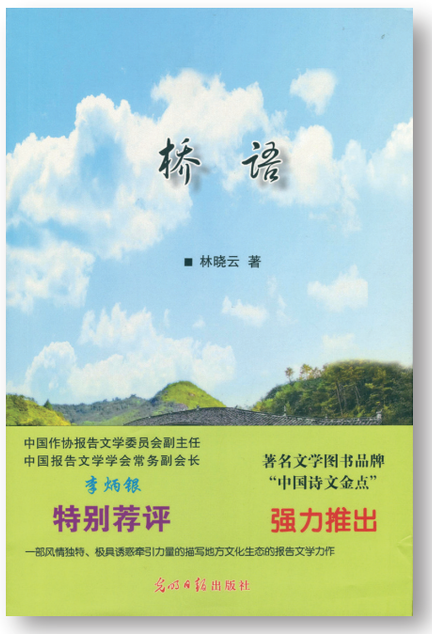
《大国行动》正确深刻地表现了中国海军的英雄气概，塑造了中国军人英雄形象。《大国行动》严格按照报告文学真实性的原则，力图真实还原历史事件，真实描写现实生活的状况，表现真实的人性与精神。因此，在描写中国军人英雄形象时，特别注意突出他们作为一个普通军人的一面。他们并没有电影中那种传奇英雄的本事，也没有什么超常能力。他们甚至还有许许多多普通人的困顿和烦恼。就像书中补给舰液货班班长凌章权。他7次到亚丁湾，自己的婚姻问题老也解决不好，家里大大小小的事也帮不上忙。正是这样的普通军人，当国家需要他们时，仍然义无反顾，坚决服从。从他们平静的脸上，看不到生活的压力，看不到现实的苦痛。这个时候，他们的眼里，只有国家民族人民，只有军人的天职。他们聚集在一起，就是国家的意志，国家的力量。

《大国行动》对当代中国军事文学创作有宝贵意义。和平时期描写战争，大都是假定性的虚拟战争。一场演习搞得再逼真也是演习。在这个基础上写战争，很难写出战争文学那种人性的冲突、灵魂的搏斗、精神的考验，也就很难有大突破。而《大国行动》所描写的事件，则完全超越了假定性虚拟性的格局。这支未曾参加过战争海军编队，突然冲向真实的战区，进入处于战争状态的港口码头。虽然自己没有动用一枪一炮，但战争双方的炮弹就落在舰首附近，随时都会有伤亡，战争氛围格外凶险浓烈，每一个人都经受着战争的考验。可以说，这是近年来，中国海军第一次如此接近真实的战争。中国文学也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描写现代战争。这样的描写，很多年来，我们的作品还未曾有过。也许这不算是战争文学的大突破，但却清晰地传递出拓展新格局的信息。

■书者话书

一缕乡愁廊桥梦

□林晓云



水是春的使者，是万物的精灵，唱着歌的暖意，顺着季节的迂回与春相恋，一季一季地把春推向柔情。

千百年来以山寓居的泰顺人逢山开路、逢水架桥。在飞瀑、水潭、涌泉、山涯间，他们腰缠吊索，用简陋的工具削山切壁，肩扛背驮。从重峦叠嶂的山水中开出一条通天大道，一座座廊桥从此便有了历史的厚度。

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里，有一座很抢眼的木拱桥，因其形似彩虹，故名虹桥。虹桥是中国四大古桥之一，它的建造昭示着中国桥梁技术的一个巅峰。许多研究中国桥梁建筑史的专家认为，自清代中期以来，木拱桥的造桥技术失传，这道美丽的彩虹已经消失，它只存在于张择端的名画中。这种认识直到1980年才有所改变，那年，桥梁专家在浙江文物普查里发现了这个惊天秘密：“泰顺境内有几十座形状怪怪的八字拱桥”。几位专家迫不及待地赶赴泰顺，当群山里一座座形态各异的廊桥映入眼帘时，他们惊呆了：“这不就是失传800多年的虹桥吗？”

她朴实得像一位洗尽铅华的妇人，安静地横跨于两山对峙的峡谷中。褐色的板木为衣，青瓦为帽，掩不住那曾经娇美的容颜。

因为廊桥，泰顺山村变得绮丽又神奇。数百年后，一群远方来客，因古廊桥不远万里慕名相聚。

故事在春意的时光中慢慢走近……

泰顺廊桥以其独特的传统营造技艺在世界桥梁史上堪称一绝，其学术研究价值在世界上是不可替代的，在古桥技术研究领域被称为“侏罗纪公园”，是北宋时期虹桥结构的变体。堪称世界桥梁史上木结构桥梁杰出典范的泰顺木拱廊桥，也就有了“桥梁活化石”之誉，具有珍贵的考古价值。

在其兴建之初，村民借以建于水尾的廊桥及桥旁的庙宇、古树来“锁关”，锁住财气，留住吉祥，于是“杠梁已成，人不覆危”。后来，廊桥功能日趋多元，融神灵祭祀、交往娱乐、文史传播、景观地标等于一体。人们捐资出力，共同兴建廊桥；祭祀神灵，举办民俗活动；休息聊天，看戏观评书。廊桥这个特殊的公共空间，在这崇山峻岭中，在自给自足的传统村落里，已成了村落营造中的一部分，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廊桥丰富的文化功能，也使之成为地域文化及中国传统乡土文化鲜活有力的记忆。

工艺师们按照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需要设计各式桥饰艺术作品。桥头上的土地庙承担着桥梁守护神的角色。各类学者、文人从各个角度创造着桥文化。如众多的桥联、桥碑、桥名、桥画、桥梁摄影、桥梁书法、桥梁故事、望柱、桥梁文学作品、桥梁影视作品、桥梁网站等都是桥梁文化的产品。

在信息闭塞、文化生活相对贫瘠的传统村落，人们在廊桥上交流信息，同时，廊桥也是古代文人墨客文化创作的重要题材与载体，于是，廊桥这个奇特的公共空间，成了多元文化的承载物。

“廊桥起源”、“廊桥之子”、“桥梁建筑”、“廊桥工艺”、“造桥民俗”的创作主体因历史而触发的现实的感悟，从而使桥语获得博大的历史意蕴和延展活力。

大凡人们普遍向往的名城胜迹，总是古代文化积淀深厚、文人骚客留下较多屐痕与墨痕的所在。廊桥的祭祀文化、尝新节、文昌阁文化、木偶文化，让已逝的风烟在眼前重现华采；“廊桥劫难”，“全城搜救”“痛定思痛”的过程在历史中留痕，存在与虚无、永恒与有限、成功与幻灭的不倦探寻，都在新的境遇中展开，给了我们远远超出生命长度的感慨。

泰顺的山川呈现出画一般的精美、梦一样空灵的形态，人们登临远目，抚今追昔。就这个意义来说，赏鉴自然，实际上也是在观书读史，体味古往今来无数哲人智者留在这里的神思遐想，透过“人文化”的现实风景去解读那灼热的人格与鲜活的事件。

全书以泰顺国宝非遗廊桥为主线，以浩瀚厚重的区域文化为载体，以不同时间和相对应的空间为背景，用散文笔调讲述了百年泰顺逢山开路，逢水架桥，舍小家，为大家，创造、传承、保护一座座风情各异的非遗廊桥史事及勇敢勤劳的泰顺人。在我看来，廊桥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坐标，也见证着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至德至美至仁至善的薪火相传。

■新书品荐

特约撰稿：李林荣

《喧闹的骡子：留学生与中国现代文化》（修订本），李兆忠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4月出版

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文化的兴起和发展，被当作现代世界文化、文学演变全局的一个环节和一个部分来理解、阐释和评价，这种认识方法现在大概已经很少有人会质疑。但如果由此，把整个中国现代文化、文学都指认为中外文化、文学交流融合的结晶，以至用“骡子”来比喻，恐怕就有很多人不以为然。20多年前，在北师大新一届研究生开学典礼上，一位现当代文学专业的资深教授上台发表寄语，劈头就介绍自己是研究“骡子”文学，引得满堂惊异、全场哄笑。接下来他又解释：没有中外文化、文学的杂交，就没有中国现代文学，这不就像骡子出自马、驴杂交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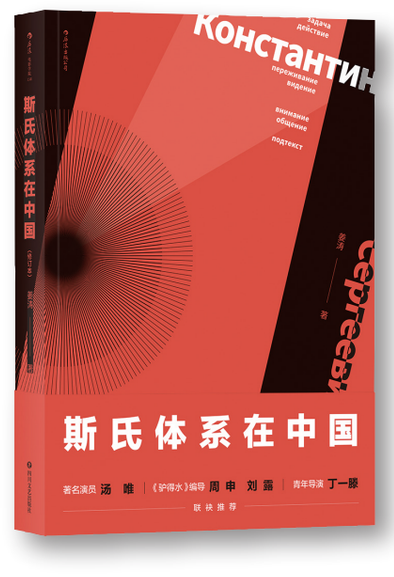
想来当时在场的听众，尤其是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学生，尴尬之余，多会有些意欲反驳的念头。但看说这话的先生，本身就是以最具本土特色和民族气派的传统现实主义作家作品的研究见长的前辈，而并非“在外国人面前研究中国、在中国人面前研究外国”的一派所谓脚踏中西两条船的学者，于中于西无论哪一边都还毫无研究的后生小子，哪配费神置喙、争辩什么呢？《喧闹的骡子》的作者，显然和自称研究“骡子”文学的老教授英雄所见略同。不仅如此，在“喧闹的骡子”这个书名和汇集在这一书名下的18篇文章里，“骡子文化”的内容和意义，从更全面地切合史实和更深入地明辨学理的意义上，得到了系统的丰富和拓展。

2010年这本书初次出版时，自上世纪末开始，文坛学界聚讼不已的所谓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两派思想潮流孰优孰劣的话题，还沸沸扬扬、高热未退。与之关联，针对近现代留学欧美和留学日本出身的一批文化名人的生平传述和历史评价，已在众说纷纭中日益趋于刻板和简单化。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把留学欧美和留学日本的经历，分别跟思想上的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立场直接挂钩。对此，《喧闹的骡子》当年的问世，犹如下了一服镇定剂和清醒剂。

书中详细评述的14个人物，无论是严格意义上的留学生，还是只在国外工作、旅居或生活过而没有正式入校深造的，都展现出了各自置身域外时期生活际遇和思想状态的复杂情形。同是留学日本，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陶晶孙、丰子恺，在接受日本社会文化和生活风尚的影响方面，不但有程度深浅和范围大小之别，更有层次高低和旨趣雅俗之分，根本难以归作一派。而同样留学美国的胡适和张闻天，则在看待和感受整个美国社会的态度上，几乎截然相反。老舍对于英国，巴金和傅雷对于法国和欧洲大陆，以及徐志摩对于美国和整个欧洲，游于斯、钓于斯的一段生活带来的机遇和感受，也是各具特色、鲜见共性，无法一概而论。

看得出来，《喧闹的骡子》的立意，并不在赶话题热点，而在为一个在喧闹中明显跑偏了的热门话题正视听、补细节，见证话题本身的复杂性和相关史实的丰富性。于是，一些我们非常熟悉的人物，从书里陆续亮出了可能会使我们感到陌生或者意外的一面，如：在孤寂中背对日本文坛而遥望西方，苦苦求索精神资源的“原鲁迅”；先是怀抱从军梦、散漫游学于东洋，尔后又转赴英伦专心攻读、最终确立起坚定的科学化人格的丁文江；因基督教传教士的帮助而得以旅英任教、到了英国后却与基督教断绝了联系的老舍；旅法、旅日期间，通过文学创作一厢情愿地勾画和追逐“世界公民”想象、对现实素材有意无意地做了反转、裁切和改写的巴金。依作者在书前两篇序言和书后关于留学生写作及留学生形象的三篇综论里的一再阐述，对这些远去的人与事的追述，不只为了怀旧，更着意于为今天“骡子文化”的退化远胜于优化和进化的态势，提供一份生动翔实的历史参照。

《斯氏体系在中国》（修订本），姜涛著，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这部58万字、400多页的大16开厚书，是一部既讲故事也讲理论、内容丰富而形式独特的著作。书名中的“斯氏”，指的是俄国和苏联时期享誉世界的著名导演和戏剧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Stanislavski，1863-1938）。他在中国的影响之大，从他晚年出版的那本《演员自我修养》，在1936年以英文版面世之初就译介到了中国，之后反复重译、不断再版，至今仍是流传在专业演员和表演艺术爱好者当中的热门读物，由此可见一斑。当代中国戏剧理论话语中流传的所谓世界戏剧三大表演体系之说，不仅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列在第一位，而且也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中国和欧洲戏剧表演领域的显著影响，作了印象式的肯定。

但在这部厚重的《斯氏体系在中国》以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理论和戏剧实践如何传入中国，又如何一步步落地生根、沿着不同的方向和层面传播发展，造成了怎样的具体效果？这些情况一直没有得到清晰完整的总结梳理。同时，有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理论本身的某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和误解，却渐渐积淀成了标签化的定见。《斯氏体系在中国》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共含七章，从“早期译介、实践和理论研究”着手，为斯氏体系中国化的百年进程正本清源；以1950年代“苏联来华戏剧专家的教学与创作”为案例详解，精准还原斯氏体系的正宗传人在中央戏剧学院执教和在中国舞台上执导戏剧演出的鲜活细节；最后又专列“我国戏剧家对民族演剧道路的探寻”一部分，介绍并评析了孙维世、金山、欧阳山尊、焦菊隐、黄佐临、徐晓钟等几代戏剧艺术家，在学习和践行斯氏体系及苏俄戏剧传统、推进戏剧民族化和现代化方面，所作的持续努力和多番尝试。

通读全书，虽是从移植欧美戏剧和日本新派剧的起点上偶然出发，但很快就自觉定向于学习俄苏演剧方式和剧场艺术，并且沿着这条轴线步步纵深、越来越明确地致力于展开现实主义戏剧民族化道路的一幅中国现当代戏剧演进的动态全景图。与此相伴，长期以来，被简陋地概念化为“体验派”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理论体系，也舒展开了它自身的发展脉络和丰富而辩证的实践触角：“从自我出发”的日常表演训练、“永远都只是在表演自己”的舞台感觉角色意识、演出情境中随时为对手“命名”的表演心理技巧、把下意识的情感线和心理线贯串在形体行动线里面的表演观念，甚至要养成角色和演员双重人格集于一体而又相互转化的精神机制、训练从台词的表面意义中准确把握和提取潜含的戏剧动作的能力。

所有这些散落在斯氏体系各发展阶段和各路传人演剧实践片段中的理念主张，如今荟萃成册，遍览之下都如碎金闪烁，绽放着点点滴滴启人深思的光泽。特别是在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重又复苏、勃兴之际，不但导演、演员和剧作家需要再次认真领略斯氏体系的精髓，而且在内在机理上，也与表演艺术多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小说、诗歌和散文的创作，都很有必要重视来自斯氏体系及其中国化经验的营养或启益。